

中学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



孟子选注

周满江 注译

漓江出版社

中学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

孟子选注

周满江 注译



漓江出版社
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选注/周满江 注译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4. 10

ISBN 978-7-5407-7248-2

I. ①孟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儒家 ②《孟子》—注释 IV. ①B22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1135 号

责任编辑:刘树勇

封面设计:沈艳君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六合村西甲 1 号
(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1118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6.625 字数:140 千字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2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10-69599001)

前 言

一、孟子的身世与思想渊源

孟子名轲,关于他的字,有子居、子车、子與三种说法,至今未能统一。他是战国时代儒家学说最正统的代表。他的生卒年月,古代没有确切的记载,后人推测他大约生在周安王十三年前后,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后(约公元前 372 年—约前 289 年),享年大约在八十岁到九十岁之间。他的出生地是邹国(今山东邹县)。邹原是春秋时代一个很小的诸侯国,与鲁国为邻,后被鲁国兼并。相传他是鲁国大贵族孟孙氏的后代,因孟氏子孙衰落,而迁到邹地。

传说孟子的父亲早死,家境贫穷,母亲仉(zhǎng,音同“掌”)氏靠纺织为生,最初住在墓地附近,孟子受其影响,就学祭奠的礼仪。他母亲认为这是不务正业,就搬到一个市场的旁边,在商人的影响下,他就学做买卖。他母亲又赶快搬家,在一所学校的旁边住下,朗朗的读书声吸引了孟子,于是他开始读书、学礼节,他母亲才觉得住对了地方。起初,他读书并不用功,比较贪玩。有一次他玩到天晚才回家,母亲很生气,立即停下织布机并拿刀割断了布。用这个行动向孟

子说明,学习如果中途而废,将会一事无成。孟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,从此以后刻苦学习,学问长进很快,终于成为当时掌握儒学精义的大师。“孟母断机”也成为了圣母教子的典范。

孟子能掌握儒学精义,传孔子学说的正统内核,与他的师承不无关系。由于文献的缺失,目前只知道,孟子是当时著名的儒者子思的门人的弟子(此说据《史记》本传。汉代刘向《列女传》说孟子直接师事子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自注称孟子为子思弟子)。子思名孔伋,是孔子的孙子,受学于孔子的优秀弟子曾子(名参),继承孔子的学说,并有所发展,著作有《子思子》,已遗失。仅有《礼记》中的《中庸》一篇,学者认为是他的作品。孟子虽然仅受学于子思的弟子,但所受的儒学传统理应比较纯粹,感情也较亲近。他对孔子也极为崇拜,自称为孔子的私淑弟子,所以在学术思想上,他以孔门嫡传、儒学正宗自居。对当时的其他学派,如墨家、道家、农家、法家等都有所批判。从中年到老年他都是胸怀浩然之气,不知疲倦地率领弟子公孙丑、万章等周游列国,劝导诸侯,宣扬儒学,使儒学的影响日益广大,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。他自己也以五百年一现的圣哲自居,声言“若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哉?”(见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但由于他的学说不合当时多数君主的胃口,而始终未受重用。齐威王与齐宣王热爱学术,在国都临淄设“稷下学宫”,尊养学士一千多人。孟子两次到齐国游说,彼时正当稷下学宫的鼎盛时期,因而受到了齐宣王的重视,授予他上大夫的爵禄,加齐之卿相,但只是顾问性质,并不任实际上的职务,所以孟子并没有掌握实权。到老年只好聚徒讲学,成为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”的一代宗师。除了教学之外,他和弟子后学一同回忆自己的游说经历,把所见所闻与自己的言行写于简策,编成《孟子》七篇,流传至今,成为研究孟子思想与文章的主要资料。

二、孟子的时代与事业

孟子之所以很难实现为诸侯师的壮志,是因为战国正是兼并战争最激烈的时代。战国七雄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,都经历了无数次大战,把春秋时代的成百上千的小诸侯国兼并已尽,重新分配了领地。原为公或侯的,强行提高了自己的爵位封号,自行称王,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。原是大夫的,也凭借武力或阴谋,变身王侯。春秋时代高唱的“尊王攘夷”,追求霸业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。孔夫子所倡导的礼乐与仁义道德,早已被抛诸脑后。法家的商鞅以法术使秦国富强;善于执法、用兵的吴起,使楚国威震诸侯;齐用兵家,孙武在吴,孙臆在齐,在楚。他们都在军事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,他们的军事著作,至今仍被奉为理论经典。苏秦、张仪操纵着合纵与连横的战场。各国君主均崇尚武力,致力于发展“王天下”的统一中国的大业。权贵们为了攻城略地,用尽阴谋诡计。儒者所追求的礼乐仁义、忠君孝亲、敬爱诚信,已为王侯所不屑。尔虞我诈、巧取豪夺、烧杀抢掠、攻城灭国,被尊为贤能。无休止的攻城略地,使庶民百姓陷于水火之中。即使贵为王侯,也有土地日削、朝不保夕的恐惧。因而全天下各家各派的学者,都认识到统一的重要性。

怎么统一? 由谁统一? 各家答案不一。法家认为必须用严刑峻法、富国强兵的办法统一天下。兵家注重武力,道家提倡无为而治,纵横家以合纵连横击倒对方。以孟子为代表的儒者认为仁义是天下无敌的统一利器。《孟子》七篇,都贯穿着仁义无敌的思想。但结果却是任用法家商鞅、李斯的秦国最为强大,远交近攻,所向无敌,最终

灭了六国,统一天下,始皇帝建成了以军衔制的秦帝国,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。孟子则落了个“迂阔”的评价。后汉赵岐《孟子题辞》说:

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,将遂湮微,正道壅底,仁义荒怠,佞伪驰骋,红紫乱朱。于是则慕仲尼,周流忧世。遂以儒道游于诸侯,思济斯民。然由不肯枉尺直寻,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,终莫能听纳其说。(见清焦循《孟子正义》第一册)

所谓“迂阔”是说距离王侯们要求远了。各国近期急需的是解决攻城略地的战术,而孟子高唱的是治国的长远方略。王侯们从不说他的王道强国之路错误,只是说他脱离实际,目前做不到或懒得做。因为王侯们随时都面临着灭国之危。他们不理解孟子所提倡的仁义之道也是救国之本。因为他们只看到外部敌人的刀剑威胁,看不到自身所作所为才是更大的敌人。

任何一个强盛的王朝,如果不注意仁义礼智信等的道德建设,就会从内部腐败。一旦腐败,从帝王将相到庶民,就会不择手段地追求享乐、权势和财富,进而寡廉鲜耻地相互争斗,最终导致国家的败亡。周文王、武王从夏桀商纣的亡国的事实中,认识到这种危机的严重性,于是选贤予能,实行德政,建成了强大的西周王朝。西周天子享国二百五十七年。中途出了一位暴虐的周厉王,被国人推翻。周宣王中兴以后,为王四十六年,传位给周幽王。幽王腐败荒淫,宠爱褒姒。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,点烽火戏诸侯。激怒诸侯,失去了君臣之信。犬戎乘机攻破镐京(在今西安),杀幽王,掳褒姒而去,导致西周的覆灭。此时诸侯们还算仁义,拥立太子宜臼,是为周平王,迁都洛邑(今河南洛阳),史称东周。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春秋时代的开始。

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,诸侯们不遵守周礼,私自征

伐,扩展领地,争夺权势,架空天子。儒者从这样的现实中看到了社会的危机,以孔夫子为首的儒士提出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观念,作为挽救天下的良方。因为礼是维护社会君臣上下尊卑的乃至家庭秩序的工具;社会甚至是一个团体,都不能没有礼。义是使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,也是人格的本质。讲人格,就不能见利忘义,胡作非为。仁是爱人,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,有了仁,社会才能和谐太平;知(智)是智慧,知识,认识能力。有知,人才能创造发展,辨别是非。信是诚信,对朋友、君主、百姓都要诚信。这些德行是为人的根本,所以称为“五常”。从上到下,人人遵守这些道德规范,天下就不会大乱。这是儒者的理想。但从孔子到孟子时代已有一百多年,论时间也不算短了,不但收不到什么成效,反而愈演愈烈,好战者仁义扫地,儒者也理想成空。孟子的游说,虽被讥为“迂阔”。但仍不失为治国修身的良方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,无数的圣贤志士,舍生取义,以生命维护家国生存与统一,乃至崇高的人格,全靠“五常”之德的教育。宋朝改革家王安石在改革失败以后,退居家乡,想到孟子的遭遇,似有同感地写了一首诗《孟子》:

沉魄浮魂不可招,遗编一读想风标。

何妨举世嫌迂阔,故有斯人慰寂寥。

改革家常不为世人理解,不等于他的主张错误。孟子的主张是治国的根本良策,急功近利者自然不易接受。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,孟子的主张不能实施,并非“迂阔”使然。思想家的主张只有在当政者的权力配合时才会起作用。否则,任何优秀的思想都只是空谈。

三、孟子与道家、法家的论战

从春秋时代到孟子的时代,诸侯们已经混战了将近四百年,人们普遍地产生了厌战情绪。不仅儒者认识到天下统一的重要性,道、墨、法等主要学派都围绕着统一中国的课题展开论战。

法家以为在战国时代必须实行严厉的法治,使臣僚以至于百姓,效忠君主,勤劳耕种,勇敢战斗。然后,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动战争,用武力战胜群雄,统一天下。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对儒者的批判十分激烈,认为在战国时代讲仁义完全过时。因为上古时代人民少禽兽多,容易取得食物,财物也用之不尽,人民不必争财夺利,为君者不必重罚厚赏,也无人作乱。而且,上古的君主质朴无华。尧为帝王,住茅屋,吃粗粮,冬披兽皮,夏穿葛衣,与民无异。大禹为君时代,带头执耒耕田,非常辛苦,“股无胈(ba 八,腿上的细毛),胫不生毛。”可见,那时的君主还不如现代的县令,所以无人争抢王位。周文王处丰镐之间,占地不过纵横五百里,体仁行义,关爱百姓,就可以称王了。在当今,有个徐偃王行仁政。楚国感到威胁,就赶快用兵灭了他。这说明“世异则事异”、“事异则备变”。因此,在依靠武力取胜的时代,行仁义是不可的。韩非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,在敌国的武力威胁时期,不注意强大的武装建设,仅靠仁义道德是无法保卫国疆的。所以法家很容易地得到了齐、秦、楚的任用。王侯们认为有了暴力统治,庶民就会安分,至于仁义可有可无,这样孟子就被冷落了。

道家在孔子时代,就以激烈的言辞批判儒家的理论。道家始祖老子作为史官,理应对周朝的礼乐制度非常熟悉。但他在礼崩乐坏

的时代,并不热衷于复兴周礼。而是认真反思,深刻地批判礼乐中的消极成分。针对君主和士大夫的伪善,指出仁义礼乐不过是束缚人的精神桎梏。因而主张“绝圣弃智”、“绝仁弃义”,无为而治,使民“自富”、“自化”、“自正”。这是一种解放百姓的主张。到庄子时代,道家对儒者的批评更加激烈,在《庄子》一书中,儒生被描写成盗墓贼、强盗的帮凶、追逐权势的贪官污吏。在各方的批评声中,孟子坚定地维护儒家的礼义治国的理想,在论战中不断根据时势变化改变、丰富孔子的学说,并积极游说诸侯,寻找执政的时机。在《孟子》中,很大部分都是以论辩的形式,不点名地反驳道家的言论。孟子认为否定儒家的圣贤,不讲仁义道德,王侯与官吏必然腐败,上下就会尔虞我诈,以至于动乱不堪。

孟子认为,要想国富兵强,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,既不能无视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社会存在,无为而治;又不能走以力服人的“霸道”之路。而必须实行以仁义为基础的“王道”。所谓“王道”,就是以德治国,以德服人,对内实行仁政,在上的王侯将相为庶民做出榜样,使远近各诸侯国的士庶百姓归附于己,这样,统一中国的大业便会水到渠成。孟子所谓德,就是孔子讲的仁德。把仁德用到政治上就是仁政。这个仁政的具体方案是:实行井田制度,给百姓每家一百亩田地,使其足够养育五口老小,同时,与其他七家共耕井田中间的公田,作为地租。另给五亩宅地,种桑养蚕,养鸡养猪,这样就不仅能让老老少少都有饱暖的生活,而且老人还可以穿上丝绸,吃上肉类。在百姓温饱的基础上,再进一步兴办学校,进行仁义孝悌的教育,以造就尊老爱幼、效忠君主的风气。孟子常对君主们说,谁能实行这样的仁政,谁就是得道的君主。“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。”不但会得到本国乃至全天下百姓的爱戴,而且还会得到众多的仁人俊杰的辅助,使国家富强,无敌于天下。最终至于仁德感天,获得天命,称王于天下。

要以德治国,关键在人。孟子认为:首先要求君主与执政大臣有仁德。君主有德,就能“贵德尊贤”,使贤者在位执政,使能者在职办事。这样的朝廷和官署就可以成为清正廉洁,办事能力强大的官府。孟子特别提醒君主:君权虽然是天授予的,但天只不过是给你一个王位,并不是永远给你天下的所有权。如果为君有道,百姓拥护,上天就继续保护你。否则,民众就可以推翻你,上天会根据民意另选新君主。比如成汤讨伐暴虐的夏桀,周武王讨伐荒淫的殷纣王,并不是大逆不道的“弑君”,而是符合天意民心的“征诛”。为了保证有德的圣君在位,孟子最理想的是所谓“禅让”制度。这种制度,就是圣明君主在退位的时候,经过认真考核,选拔一位有德之士继承王位,而不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孙。本来禅让制度只不过是远古的一种传说,可能存在于原始社会,而孟子把这种传说吸纳到他的仁政理想中,并反复地加以论述,其目的:一是要说明“仁德”对君主的重要性;二是要说明人民的重要性;三是他看到了世袭制度的严重弊病。

关于君主与人民的轻重,孟子还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,即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(见《孟子·尽心下》)这个观点把春秋以来的民本思想推进了一步,把民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,而且认为社稷和君主都可以“变置”。只有人民是不可替代的中心,谁得民心谁就可以做君主。这里体现了孟子思想中的民主成分。孟子的设想途径是:百姓发泄不满情绪,感应到上天,于是上天震怒,变置君主,把王位另给德行圣明的人。

四、寻求人的善性,为仁政理想构筑理论基础

要施行仁政,首先要求执政者具备仁义道德,爱百姓,把百姓当

人看,关心他们的生存。否则,所谓的“仁政”便是一句空话。在这一点上,当时的儒家学者的看法,都是一致的。但君主、大臣、士子怎样成为仁德之士,他们的看法却不一致。

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认为,人性本来是恶的,人生来就有好利、好声色、好恶的本性。如果不严加控制,任其发展,就会走向淫乱暴虐,成为社会礼义的破坏力量。因而,主张用仁义礼乐的教育来遏制恶性,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。同时,还要以严刑峻法予以威慑,使人不敢为恶。

孟子则认为人生来就有善性,为证明这一点,他引述一个故事说:一个小孩子在玩耍时,懵懵懂懂地爬到了井边,眼看要跌到井里,周围所有看见的人都会自然地惊恐起来,并抢先把孩子救到安全的地方。询问这些人后,发现他们一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,二不是为了讨得众人的赞扬,三不是怕听孩子的哭声,而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“不忍之心”。孟子由这件事得出结论: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这种“不忍人之心”又叫做“恻隐之心”。孟子认为不仅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”。同时,还有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,也是“人皆有之”的。由于这四种心是人天生具有的,只是还处于萌芽阶段,所以称为“四端”。恻隐之心,是仁的开端;羞恶之心,是义的开端;恭敬之心,是礼的开端;是非之心,是智的开端。(原文见《告子上》)实际上“四端”只不过是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,自发的低层次的善心。孟子认为,如果要把这种低层次的道德萌芽,提高到高层次的“四德”,也不是难事,只要通过认真地学习修养,对这四种萌芽状态的善性加以扩展提高,就可以达到仁人的境界,所以他说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。与此同时,圣人与杰出之士还具有与生俱来的超越芸芸众生的智慧与能力,叫作“良知”“良能”。(原文在《尽心上》: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,其良能也;所不学而知者,其良知也。”)对孟子的这个命题该怎么评价?我们择录《中国哲学史》上一段话供读者参考:

在我们看来,孟子所谓的良知,实质上是道德潜意识的表现。它是人类在社会交往中逐渐积淀而形成的,是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心理和感情。其中从其动物祖先遗传而获得的先天成分或因素极为有限,并且处于从属的地位。人的族类是如此,个体良知的形成也要在其心理结构中有一个积淀过程。所谓“不虑而知”和“不学而能”,只能说明良知的形成过程是不自觉地、无意识的。(刘文英主编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册,第141页,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)

既然每一个人都有提高自己的道德与智慧的能力,人就应该努力上进,做国君的应该把“不忍人之心”扩展开来,用于政治,在自己的领地上推行仁政,造福于人民,同时也可以使国富兵强,巩固自己的统治,成为仁君。如果进而以王道统一中国,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,做到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、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,其道德业绩流芳百世,足以为后世楷模者,就达到了圣君的境界。与荀子的性恶论比较起来,他更注重人的内在修养,更强调修身的自觉性。所以,对于一个士来说,首先要努力学习,提高仁德,做一个大丈夫:“居天下之广居,立天下之正位,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与民由之,不得志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。此之谓大丈夫。”(见《滕文公下》)在此基础上,使道德与贡献达到出类拔萃的程度,其光辉足以照耀人寰,为世人的最高表率,从而感化世人,就可以成为圣人。这说明圣人与凡人之间,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,一切成就都决定于自己的努力程度。孟子的这种成就人格的观念,影响很大,在造就中华民族的积极顽强的性格方面,起着无可比拟的作用。

五、义、利与大丈夫的精神境界

关于利与义的问题,孟子发表过一段著名的影响深远的言论,在这段言论中他说:鱼是自己想吃的,熊掌也是自己想吃的,但二者不可能同时给我,只能选其中之一,那我就选择熊掌而舍弃鱼,这是因为熊掌的价值比鱼高。显然,孟子是以鱼和熊掌作比喻,说明一个选择的原则:当两种事物的价值贵贱高低不同,而你只能从其中选择一种的时候,当然要选择价值高的那一种。同理,生命与道义也是两种价值不同的事物,也都是自己想要的。当在某种特殊情况下,你不能同时保有,只能选其中之一,该如何选择?这是自古以来许多人会遇到的问题。有些人会见利忘义,有些人会舍生取义。孟子提倡舍生取义。因为,生命是属于自己的,生命之利是属于个人的。相比之下,个人的利是小利。而义是属于他人的、民众的、国家民族的,相比之下,这是大利。舍生取义者,实际上就是为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大利益,而牺牲个人的小利。为国家、民族、人民而牺牲个人的生命,比保全个人生命更有意义,其价值重于泰山。要做到这一点,必须有崇高的精神境界,如上文所讲的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,都可能做到。孟子的这个观点,令其后的每一代的圣哲叹服,从而培养起了一代又一代的为正义事业而勇于奉献的义士,为民族大义而宁死不屈的英雄。我们读《孟子》,时刻都会感到他的使人震撼的“浩然之气”。他不求官、不爱财、不求安逸、不畏千里跋涉之苦。一心一意地推广仁义之道,规劝王侯们实行仁政,救庶民于水火之中。到老年,仍孜孜不倦地以教育英才为最大的人生乐趣。可以

说,他为仁德的政治,为庶民的福祉,为天下的兴旺,贡献了终生,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古代圣贤。他的言论更是值得研究学习的。

六、文学思想与文学成就

孟子在散文与诗歌方面都有很精辟的见解,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著,千百年来在文坛影响深远,被视为学习的楷模。

孟子的文学观点并没有写成系统的文章,散见于和弟子的对话中,我们把这些材料整理起来约有以下两点:

1. “知言”与“养气”:卓越辩才与崇高的精神境界。

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:老师您有什么特长? 孟子回答说:我“知言”,我善于培养自己的“浩然之气”。(原文见《公孙丑上》)

所谓“知言”,就是善于剖析世人言论的善恶美丑,知道错误言论的问题所在。孟子自己解释说:对于言辞偏颇的,我知道他们在哪些地方认识不清;对于言辞过分的,我知道他们在什么问题感到困惑,而言辞邪曲的,我知道他们在哪些问题上背离了正道;对于闪烁其词的,我能看出他们在什么问题理屈词穷。

所谓“浩然之气”,是一种崇高自信、刚直不阿、正气凛然的精神状态。孟子认为这种精神,是和“义与道”相配的自然流露,也就是说,是通过对仁义之道的学习,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,培养起大丈夫那样的精神境界(内容见上文),作一个“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人”的高尚的人,就会在行动情态中,在文章言论中,自然表现出“至大至刚”的浩然之气。

知言和养气实际上是密切联系的一件事。人常说站得高看得

远,你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与理论修养,才能够对客观事物作出深刻而中肯的分析,对别人的言论作出中肯的评论,你写出的作品,也才能有一定的深度,被读者肯定,被世人接受。

2. 怎样研习古人的诗文:“知人论世”与“以意逆志”

孟子认为读古人的书,就是和古人交朋友。孟子对弟子万章说:在善士之间广交朋友,还觉得不够,于是还要和古人交朋友。和古人交朋友,就是读古人的书,吟古人的诗。既然读古人的作品,就应该懂得作者的身世、思想和时代背景。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意义。(原文见《万章下》)

所谓“以意逆志”,就是读者以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方法,去体会诗词藻所表现出来的内容。“逆”字的意思,是迎合,是说读者读一本书的时候,实际上是以自己的体会去和作品的内容融合交流。由于每个读者的身世、处境与思维方法不同,对诗文的体会角度与深浅层次便会不同,甚至会正误相反。但作品的词藻所涵盖的作者的思想内容是客观存在,并不因读者的理解不同而改变。读者的阅读过程,实际上是以自己的体会与作品的内容不断地交流、融合,也等于和作者交流谈心、交朋友。所以说孟子把读古人的书比作与古人交友,是很有心得、也很形象的说法。

孟子提出的这两种读书方法,可以让人把书读活,而不至于死记硬背作品的词语。

孟子讲的虽然是读古人作品的方法,但他的意义不限于此,因为它所讲的方法也适用于哲学与文学的批评、批判。所以,自孟子的主张被发表出来以后,很快就被人接受,而成为了两千多年来的经典原则。

七、《孟子》散文的价值与影响

《孟子》一书共七篇，每篇又分为上下两篇。主要是孟子本人所作，少数篇章是他的弟子万章等补充编订的。

孟子大半生都致力于游说诸侯，推广儒家学说，期望实现自己的仁政理想。为此目标，他与诸侯、大夫、异端学说艰苦地辩论，扩大了儒学的影响，壮大了儒学的队伍，然而，最终也没有得到实践仁政的机会。晚年带着遗憾与愤懑的心情，他修订诗书，抒写自己的不平凡的经历，抒发政治见解与哲学思想，以期垂范于后世。

《孟子》全书是孟子周游列国，游说诸侯以及与弟子问答的实录。但不是仅仅简单地写个事件梗概，而是把孟子与别人对话的过程作了详细的记录。这种记录又不是简单的笔录，而是经作者回忆、联想、整理加工之后，再加以描述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种写作方式和小说的写作方式有些相像。所以说孟子的文章，不仅包含独到的政见和哲理，而且形象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，描写了多种类型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；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格道德之美，而且让后人欣赏到了他的雄辩的艺术之美，因而深受历代文士的喜爱，并且对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犹大。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、柳宗元都号召师法《孟子》。宋朝的苏洵、苏轼、王安石等，一直到清朝的桐城派散文，都一直在学习《孟子》的笔法。即使在现代，孟子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文学主张，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他的散文写作技巧，仍然可以学习借鉴。

总的来说，孟子的文章在当时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，对儒